



贺兰山下西夏陵，世遗故事开讲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20世纪30年代，一个年轻的德国飞行员飞越贺兰山时，被一片“巨大的白色土堆”所震撼。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这一壮观的景象，照片被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成为西夏陵最早的影像。只是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知道这片墓葬群和西夏有关。

90年后，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坐落于贺兰山脉南段东麓，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西夏陵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

历史，并不只记录于纸上

要理解新晋世界遗产西夏陵，首先要了解千年前的西夏。这个并未记录于“二十四史”的王朝，留下的苍茫巨冢，巍然立于贺兰山下，遥望黄河。

“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家白河上，高歌药国在彼方。”这首出自西夏文献《夏圣根赞歌》的古老诗歌，蕴藏着党项起源的故事。7世纪前，活动于今青海东南、四川西北一带的党项族，经隋唐时期两次内迁，跋山涉水，在宁夏平原贺兰山一带发展壮大，于1038年建立了包括党项族、汉族、回鹘族、吐蕃族等在内的多民族王朝——西夏。

西夏与宋、辽、金等王朝，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盛时疆域约115万平方公里，辖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

历史，并不只记录于纸上。西夏陵，在西夏留给后世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成为揭开西夏尘封历史的关键线索。

西夏陵的考古始于20世纪70年代，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考古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接力中，逐步取得了对西夏陵较为全面的认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从2024年接过西夏陵考古的“接力棒”，他反复提到这4个字——“承窟仿宋”。

柴平平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比如，西夏陵的内外双城与唐昭陵、乾陵比较接近，陵园集中式布局又与宋陵相似；其他方面，如月城、双碑亭、陵塔等，又兼有继承与创新。“考古发现，西夏陵基本呈中轴对称的格局，但陵塔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中轴线偏西位置，这与中原地区有着显著差异。有学者认为是党项族的传统鬼神信仰，对此尚未有定论。”

柴平平说，西夏陵的选址颇具智慧。它位于贺兰山麓的积洪扇高地，受洪水威胁较小，其间还有若干条山间洪沟，水流顺势而下，将西夏陵所在的开阔之地，大致切割为4个自然区域，9座帝陵成组分布其上，以避免主要冲沟。

“目前经考古调查发现，陵区还有32处防洪工程，包括防洪墙、排洪沟等。当地气候干燥少雨，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的水流从排洪沟直接流走，小的水流也被防洪墙阻挡在外，并引流到排洪沟。”柴平平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2号陵西侧，构成遗产要素之一的防洪墙至今清晰可辨，1998年修筑现代防洪墙之前的八九百年，它兢兢业业地一力承担着职责。“天雨未未来修水渠，无有艺业知用力。”在西夏陵供游客行走的石木栈道上，刻着许多出自古籍的西夏谚语，记者正好看到这样一句。采访当天，陵区突降暴雨，但陵塔四周并无积水，古今防



西夏陵1、2号陵鸟瞰。

詹安稳/摄



20世纪30年代，西夏陵3号陵德国飞行员航拍图。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供图



西夏陵防洪墙。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供图



西夏陵博物馆内的西夏文创。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供图

洪设施都证实了自己的有效。

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介绍，可能与人们印象中的“文化遗产”概念不同，西夏陵的遗产要素还包括自然要素。帝陵、陪葬墓、北端建筑群遗址、防洪工程遗址，与贺兰山、戈壁滩、荒漠植被等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共同绘制出这一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文与地理图景。

敦煌研究院从2000年开始参与西夏陵遗址的保护工作，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到后来的主动修缮，再到今天的预防性保护。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杨善龙介绍，在当下阶段，对西夏陵遗址主要有两个工作，一是日常监测，二是日常保养维护。

“西夏陵处于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交界处，原来存在的最主要病害就是遗址墙体的根部掏蚀（因毛细水和盐害共同作用下导致的墙体根部被掏空的现象，随着时间和外力作用，产生结构失稳和坍塌风险——**记者注**）。对此，我们研发了几种技术，一是把墙体掏蚀的部位进行土坯砌补或夯筑支顶，二是把墙体存在的裂缝‘封护’起来，三是对遗址墙体表面进行综合处理。”杨善龙说，目前整体的保护效果是比较好的，已消除遗址保存的安全隐患。

贺兰山下的“桃花石”

“承窟仿宋”是西夏陵的特征，但并非西夏文化的全部内涵。今年4月末，《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桃花石”是古代中亚对中国的称呼——在他们眼中，辽宋夏金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

“西夏所在的地域恰好是丝绸之路的中国段，位于一个中轴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说。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丝绸、珠饰、金银饰等随葬品，不仅让后世得以一窥西夏曾经的繁荣与辉煌，也为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枢纽纽地位提供了生动见证。

史金波说，西夏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并进行创新和创造，“西夏文化既有自己的特征，又为中华文明作出贡献，这也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多样性”。

比如，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学教育，设立多种类型的学校。仁孝时期（1124年至1193年），下令各州县建立学校，皇宫内建立小学，并建立大汉太学，尊孔子谓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尊孔为帝，并推行科举制度。这标志着西夏完全接受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

再比如，3号陵在考古中出土的迦陵频伽达150多件。迦陵频伽，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妙音鸟”。唐代的敦煌壁画中有妙音鸟，福建泉州开元寺的屋檐下方也有妙音鸟，这只“人首鸟身”、来自印度的乐神，跃上屋脊，是中国古建筑向唐向宋演变的过程，在西夏发扬光大。

西夏文，则是显著的贡献之一。

1036年，党项民族以汉字的字形和构造方法为基础，创造本民族文字，共6000余字，沿用460余年。西夏还大力推行活字印刷技术，1991年在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の木活字版印本。

西夏陵博物馆有一个互动装置，观众输入自己的汉文名字，就能显示西夏文写法。这要归功于一本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工具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能让懂西夏文或者汉文的人，都能自学对方的文字。这本书的序言里说道，两个民族要互相学习才是正理。”史金波说。

西夏陵背后是几代人的青春

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在银川出生长大，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起西夏陵，传说这里是“吴王坟”。十几岁时，他和小伙伴第一次到西夏陵“探险”，骑了一个半小时自行车，“陵区满地的蒺藜，自行车胎都扎了好几个洞”。那时候的他没想到，自己将来要在这里待上很久。

“1998年成立的西夏陵博物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范围内收藏西夏文物种类最丰富、展出西夏文物数量最多的遗址类博物馆。”1997年参加工作的师培轶，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与西夏陵博物馆是共同成长的。

西夏陵的守护背后是几代人的青春。师培轶说：“（20世纪）80年代，西夏陵没电没网，西夏陵旅游管理所的办公场所——或者说落脚点，只有

在陵区搭的3间帐篷；1996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拉开了西夏陵发展的序幕。”

师培轶记得，刚工作时，眼前的西夏文物不到30件，“一个屋子就能摆下”；1998年西夏陵博物馆落成开放，2019年新馆开馆，如今馆藏文物达近万件，有考古发掘的成果，也有征集所得，还有热心人士的捐赠。

师培轶当过7年西夏陵博物馆讲解员，能用英语讲解，在与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等世界各国游客的交流中，他总是在琢磨一件事——“我讲的故事您能听懂吗？感兴趣吗？”他发现，普通游客对通俗易懂的故事更加感兴趣，比如，著名的武威石碑使西夏文“天书”重见天日的故事，就让他们很容易记住。

陈同滨说：“在申遗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突破自身局限。我们要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平和地去讲故事，用事实说话，要让对方先理解，对方才有可能接受。”

“申遗成功对于西夏陵后续研究与保护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陈同滨坦言，当下大众对西夏的了解是较为缺乏的，“包括我自己，在接到‘申遗任务’之前，对西夏的认识也是浅显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片文化遗产时，不断收获惊喜，我也希望能把这份惊喜，分享给更多人。”

师培轶高兴地看到，现在从外地特地来参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本地学校也组织研学活动，带着孩子到博物馆来了解西夏文化、体验活字印刷。2024年，西夏陵接待观众已达70万人次，是师培轶刚工作时的10倍；据申遗专家经验，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往往会带来游客至少成倍的增长，乃至“几次方”级。

2024年8月10日清晨——师培轶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也就是联合国专家来西夏陵调研的前两天，他一个人从遗址区最南端的1、2号陵，走到了最北端的建筑遗址。他再感受下西夏陵的美，“我真的能感受到30年来，这里的每一处变化”。

记者采访那天，雨后初晴，那是贺兰山最美的时候，吸饱了水的戈壁滩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意。贺兰山下的西夏陵，要开始讲新的故事了。

2018年毕业后，“梢丽组合”的成员都成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希望老祖宗的声音能够不断传承，而不是在我们这一代断掉。”潘婷说。

布依族的韦新琳就职于一所警察学院，为“准警察”们开展美育课程。学院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广西当地，有不少人都是少数民族，韦新琳就给他们分享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音乐，教他们从原生民歌中洞察当地的民风民情。

“我们的民歌就是田间地头的音乐，他们未来的工作也要到田间地头，服务的是基层群众。学生们对当地民歌有更多了解，就能更好地运用音乐为人民服务。”例如反诈宣传视频，韦新琳发现，在当地用民族语言和音乐来宣传反诈，群众更容易接受。“用唱民歌的方式能跟群众有效沟通。”韦新琳说。

侗族姑娘姚启媛则在位于广西崇左的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担任老师。她带起了200多人的学生队伍，有的专门学习原生民歌演唱，有的主攻民族乐器天琴。姚启媛常常带着学生们去跨国瀑布德天瀑布景区义务演出，把民歌传到更远的地方。未来，这群学生或将成为教师，将所学的教给更多孩子。

潘婷和刘海嘉则分别在广西演艺职业学院和广西艺术学院任教，她们在引导学生掌握传统唱法的同时，格外注重在创作中融入现代音乐元素。“我们的老师徐寒梅教授说过，希望民歌传承可以像星星之火，在广西大地上不断燃烧。”潘婷说。

非遗研培的「蝴蝶效应」：学员变导师 工坊带就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这套‘半刀泥沱花盏’将牙舟陶器与半刀泥（陶刻画技法名称——**记者注**）结合，是我们家的爆款。”张胜猛拿出照片，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创新成果。他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牙舟陶器烧制技艺的州级代表性传承人，于2020年参加了贵州民族大学开设的关于贵州土陶技艺的研培班，半刀泥便是他在这里所学。

陈洁也是贵州民族大学非遗研培班的学员，参加过蜡染和刺绣两个项目的培训。从前她虽然和家人学过蜡染，但对技艺的认知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对“设计”“色彩搭配”“构图”等缺少概念。她觉得，研培班帮助自己系统学习了很多设计理念和技法，提升技能的同时，拓宽了思路。

今年是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开展的第十年。贵州民族大学自2016年起开展研培计划，如今已完成传统染艺、剪纸、刺绣、民族服饰制作等项目的13期培训班，累计培养学员432名。

参加研培班时，张胜猛已从牙舟陶器烧制工作10余年，彼时正处于创作瓶颈期。起初，张胜猛对于研培班有一些担忧：“我真的能得到想要的支持吗？”“参加培训是否真的能对牙舟陶器烧制带来创新？”随着课程的开展，他的疑虑逐渐被打消。

从数字化设计理念到产品开发，从版权保护再到贵州本土元素及其他工艺融合、电商教学……张胜猛觉得，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全面，真正让自己学到了许多全新的概念和思路。“那段时间我的灵感爆棚，一天可能想出10多个设计方案。”

结合所学，张胜猛设计了“点彩茶具系列”“镶器茶台系列”等一系列新作品，销售额达30余万元。他还与父亲张禄洪一起创办公司 and 非遗工坊，为镇上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人均月增收约4000元。

用蜡染制作裙子、箱包，制作“蝴蝶妈妈”挂件……陈洁说，研培班的老师们帮助她了解大众需求，学会制作适合市场的物品。学习结束后，她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家乡非遗工坊的姐妹们。2024年，她所在的工坊平均每月订单量约4—5万件。

技能提升和视野开阔，也是万兰芳对于研培班最大的感受。她于2015年考入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在精工课学习中，逐渐发现自己对银饰的兴趣。而后，她拜师深入学习并参加了研培班。

“贵州传统苗族银饰材质和颜色单一，花纹繁复，不好搭配现代服饰。”万兰芳在保留技艺传承内核的基础上，对银饰锻造进行创新：加入现代设计理念，同时将其和刺绣、扎染，以及珐琅，陶瓷，竹编等多种材料结合，让作品既符合当代审美，又体现非遗特质。2023年，由万兰芳设计的作品《万物生》春、夏、秋、冬系列，获得多彩贵州文化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

高校非遗研培让个人提升技能、收获荣誉、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形成“蝴蝶效应”：学员成长“变身”为导师，反哺高校的人才培育，并助力非遗工坊带动就业。

“我们要焊在这个位置。”“先拿这边压，再捏紧。”记者见到万兰芳时，她正被贵州民族大学的学生们团团围住，教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从学院到教师，万兰芳将实践中的思考和学习体悟反馈到传承之中。

对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花溪苗绣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顾伟伟来说，非遗传承就是他参加研培班的初心。他在贵阳花溪经营着一家苗族服装店，约7年前，他发现当地很多民族服饰上的苗绣特别漂亮，然而能够复原图样的人，少之又少。“很多工艺濒临失传，花溪本地的很多手艺人只会做简单的样式。”顾伟伟有时拿着老物件找到手艺人，得到的回复总是：“这个东西我妈做过，但我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了。”

“蜡染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顾伟伟曾尝试自学，但只了解了一小部分。而后，他参加了关于蜡染技艺的研培班，逐渐掌握了从画、染、脱蜡，到最后成品的全过程。“你如果喜欢，可以购买成品；如果想学，我也很愿意把手艺教给你。”平时他还走入高校，教授学生非遗技艺。

非遗传承和研培计划不仅是一所学校的事，更是多个地区、多所高校、多个业态共同助力的事。

杨昌杰是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音乐（芦笙）教学与研究。2024年，他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推出的特色乐器制作的研培课程，并将芦笙制作技艺应用于他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报京乡报友村的驻村工作中。

“报京乡居住了很多侗族和苗族人民，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吹芦笙。”虽然芦笙使用频率高，但从前大家一般都从外地购买。杨昌杰调研后发现，山里盛产能够用于制作芦笙的原材料——苦竹，但没有被利用。“苦竹收集、清洗、制作等一系列过程，都能为当地带来收入，我们要将这山里的宝贝变为财富。”

在为期近两年的驻村时间里，他和同事不仅为孩子们免费推出吹芦笙等一系列少数民族特色文艺美育相关课程，还开设了芦笙制作坊，为当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报京乡90后青年周海明从来没有学过音乐，但对芦笙很感兴趣。“他每天中午12点过来，晚上12点离开，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真的自己做出了一把芦笙。”杨昌杰说，现在周海明已成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芦笙工作坊从2024年8月创建至今，带动当地30多人就业增收。



万兰芳教授贵州民族大学学生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